

# 兴业是根 就业是本

## ——围绕就业优先政策，委员们在调研路上了解到这些情况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对于全国4.94亿户家庭而言，就业不仅是“饭碗”，更关乎幸福感。当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多重挑战，当经济发展必须要答好“六稳”“六保”的时代命题，我们不应忽略每一份就通知书背后，千万双拉动产业、托举岗位的手。

“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顶梁柱’和主力军，保住市场主体就能守住我国就业的基本盘。”从今年4月调研行前会到5月底以视频方式对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输出大省四川进行调研，到6月下旬奔赴以“爱拼才会赢”著称的福建省开展调研，再到七八两月多次会议活动中，从产业角度关联到就业话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始终坚持这一观点。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强调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

今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以6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很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围绕就业，调研路上的委员们发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 稳市场主体就是稳就业

我国现有各类市场主体约1.6亿户，承载着80%以上的就业创业。

“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完善减负纾困等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夯实经济稳定运行、质量提升的基础，既是疫情发生以来行之有效的支持路径和做法，也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乃至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内在要求。”这是在与地方同志交流时，尚福林反复强调的逻辑。

通过与多省市同志深入交流，委员们发现，要稳住就业，先要体会市场主体的“烦心事”。

比如，地方上不少企业家反映，由于企业划分标准不统一，国家给予中小企业的很多优惠政策被大企业“独享”，如何确保给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精准落稳，企业家们在看也在盼；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大多租用的是非国有房产，享受不到特殊时期租金减免的政策；有企业家强调，就业是企业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事，高校毕业生不能“眼高手低”，高校也应以订单模式培养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普遍反映，近两年用工需求旺盛的数控、模具、焊接、机械冷加工、针车等专业技术人才缺口很大，有的企业长期缺工百人以上，导致企业产能无法有效提升。

再比如，来自广东的高科技企业代表反映，科技型企业需要招聘到高端人才，线上招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有不少早年流向欧美市场的高端技术人员期待回归，对于这些人才，企业求贤若渴，但要让人才在短期内到位并非易事。

还有企业反映，当前物料采购周期普遍被拉长，影响到项目的正常交付，而较长的生产运输、汇款流程又让企业流动资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裁员，“赌”的是行业的未来发展。但成本上涨确实影响了企业发展的信心。大宗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物流费等经营成本持续上涨，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甚至出现了“面粉比蛋糕贵”的情况，导致企业招工积极性受到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赛道，但现在每花一分钱都要谨慎。希望能够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负担，让企业有机会抓住新机遇。”据一位企业家透露，现在社保公积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

30%，今年9月还要补缴此前减免的税额，企业感觉压力很大。

“你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政策有哪些？为保障就业优先，你们还需要哪些政策？”面对企业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辽宁政协原主席夏德仁提问。他得到的答复是，现行政策要让中小微企业先活下来，留住“青山”、夯实信心。

### 突围之后，就是一方新天地！

尽管政策不断完善，但挑战总与企业狭路相逢。那么，在坚持应急举措和长效机制相结合，持续推进稳岗扩岗、兜住就业民生底线方面，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尝试，委员们又有哪些思考？

事实上，在稳定就业创业信心方面，地方政府采取“顶格”落实中央政策的做法，效果正在显现。

比如，地方政府设立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基金，银行给小微企业主发放信用贷款，由政府来给企业做增信支持，过去企业还需要出0.5%的增信基金服务费，现在这笔钱可以省下了。

比如，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能不能想方设法让非国有房产的房租也降一些？”的提问时，地方上的同志就表示，正在尝试将补贴政策精准用到能活下来、有扶持价值的中小微企业承租者身上。

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武警部队原政治委员孙思敬一路走来发现，很多地方在拼经济、找出路、加快市场主体转型方面都有好做法。企业有困难，政府干部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办公。另据地方上的同志透露，为了拉近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常常把一些头部企业负责人请到食堂共用晚餐，面对面帮其答疑解惑。

再比如，一些城市持续推动“千名干部进千企”行动，加强对减产、减收、用电量下降企业的全面走访力度，“一对一”协调帮助企业解决供应链、物流、融资、经营等问题，千方百计缩小工业减产产能、商贸业负增长、稳住就业。

过去很多人认为，在解决就业这件事上劳务输入大省责任更重。当前看，劳务输出大省也并非高枕无忧。视频调研中，面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钢围绕返乡务工人员群体现状的提问，四川的同志表示，四川省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异地就业，今年以来，在弹性回归的200多万人中，一部分源于沿海制造业、外贸企业不景气，也有一部分人主动选择回乡发展。为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省里牢牢把握住西部大开发以及对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同时还着力解决异地就业者的医保对接问题，为大家兜好底。

“政策点多面广，重在落实。我们能否捋一捋到底什么才是影响企业生存的最重要因素？”说是提问，其实全国政协委员，万厉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更像是抛出一个供讨论的话题。

“在我看来，就业既应优先考虑，同时也是个结果。当前就业‘蓄水池’的困境，排在第一位的还是市场订单没了，没订单也就没收入，这时就需要降成本。但成本终究能降到什么地步，大家心里都有数。说到底还是要把力量用在拓展市场上，牵住订单‘牛鼻子’，就业就有保障了。”杨成长快人快语。

从订单角度看，有同志建议给予中小微企业更多参与政府项目的机会。同时，在扩大招聘人数和支付中小微企业账款方面，大企业也要有大企业的样子。

“稳岗扩岗，央企国企确实要多分担。比如企业说今年就要100个人，能不能再多要50人？也可以为将来多储备一些人才。国资委在考核时要予以理解和支持。同时，要鼓励作为链头企业的国有企业和链上的中小企业进行对接。产业基

本报记者 李元丽

那么，如何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推动重点群体就业？王天戈表示，需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积极研究、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对稳定就业的不利影响，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拓展就业新领域新空间，进一步改善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同时，充分利用乡村资源优势，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农民就近就业，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为此，王天戈建议：一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职业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以满足企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业需求为目标，以市场急需紧缺人才为重点，优化培训项目，创新培训方式方法，选优配强师资力量，努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不断扩大培训覆盖范围，积极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普惠、均等、高效的技能培训。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引导劳动者树立正确的择业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培训过程。二是进一步推动深化产教融

合、致富引导基金这个时候也应发挥作用，有些基金要适当放宽门槛。”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会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上数字平台的个体户、小微企业数量新增了不少，是否说明平台上的生意更好做？”在与企业家座谈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这样说。

有企业家认为，选择在平台上做销售要承担较高成本，但比线下自建销售渠道的成本还是要低，这带动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数量不断增加。疫情的冲击更是无意之中促进了线上数字化营销的发展。

“就业的目的是赚钱，获得收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今天的各种灵活就业选择没准儿就会引领未来。如果监管政策一味地严，平台企业搞不下去了，占市场主体大多数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同样会出问题，不利于就业的稳定和扩大。”刘尚希说。

### 远没到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兴业是根、就业是本。孙思敬表示，要通过巩固产业链稳住市场主体，解决信心不足的问题；要通过抓大企业来稳住中小微企业，解决上下游的问题；要通过抓制造业稳住服务业，解决主副关系的问题。“稳市场促就业，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策：一是确实用真金白银给企业减负；二是纾困的顶格措施一定要落实到位；三是挖掘布局中西部劳动力市场潜力。”孙思敬这样说。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看来，地方企业家反映的多重目标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当前更为重要的是稳定地方经济、拉动需求恢复、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应高度关注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这两个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把他们引向制造业和新业态，留在沿海地区和出口加工业，防止失业减收，影响基本民生。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餐饮、旅游、文化、交通运输等中小微企业。如果企业没有销售收入，甚至破产倒闭，则减免免费的政策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由疫情导致的餐饮业销售收入减少部分，能否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保住了市场主体，就保住了就业。补贴资金可以通过发专项债方式筹集，这样可以先把眼前的困难渡过去，既能吸引人员返岗就业，也可以稳定企业心理预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毕井泉的这番话，让很多人读出了“当务之急”的意味。

“疫情对所有企业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几个省份调研下来，我们发现想干事的企业和人都很多，值得总结的好经验也更多，比如在人员流动并不顺畅的时候，很多企业想方设法把‘候鸟’留在了家门口，既稳定了就业，还提高了员工就近就业的幸福感；比如以科技创新为第一生产力的企业，一方面以机器换人方式提升了简单重复劳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又把换下来的员工用在了更需要他们去尝试的领域，使得智能化数字化的工厂里，就业岗位不降反增。”王会生提到，随着防疫政策的不断更新，很多企业的业绩会迎来恢复性增长。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哪些好的政策可以保留巩固下来，哪些应急的做法要尽快退出。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科技董事长江浩然认为，就业依靠短期补贴政策是稳不住的，只有真正让市场主体焕发生命力，才是稳就业的根本。短期看，疫情防控政策要坚持科学精准，社保名义费率也应再降一降。长期看，围绕扶持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比如一定要用科技手段、智能手段来化解企业的融资难题，同时坚定市场经济大方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毫不动摇，让他们敢于投资、拿出拼搏精神。

合、校企合作。科学统筹规划，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广泛参与、良性互动的局面。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努力实现校企合作共赢，激发双方加深合作的动力，逐步形成科学完善的合作体系。注重培养创新型高端人才，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三是进一步提升就业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以提供优质服务、便民服务为宗旨，以提供精准、适时就业信息为目标，有效整合各类就业信息资源，依托大数据平台，提高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四是健全就业援助制度，扶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和失地农民等重点群体的精准识别、精准施策，进一步健全完善精准化、长效化的就业援助制度机制，确保有就业愿望和能力的人员就业有岗位、生活有保障。五是加强监督检查，提高就业促进资金使用效能。严格落实就业促进法第五十九条关于审计机关、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规定。确保就业专项资金管理规范、使用高效。

# 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两位来自师范院校的委员有话要说！

本报记者 崔吕萍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较以往偏高。“应该说，这是个预料之中的情况，每年高校毕业生季的7月份都是青年失业率较高的一个时间点，只是今年的数据反映较为突出，我们有必要把数据背后的问题分析得更透彻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近年来一直紧盯青年人就业话题，用她的话说，劳动力供需关系是否平衡取决于教育、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如今有些年轻人“求稳”“怕吃苦”的情绪过于浓厚，或将影响这个年龄段人群“爱拼才会赢”的热情。“都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不希望高考成为孩子们的最后一搏。相比之下，职场上的努力拼搏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更不容小觑。”从老师的角度，许玲这样说。

不约而同发出相似声音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长郑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同样谈了就业供求关系，但在这之前，他认为有必要先分析一下16—24岁这一年龄段年轻人调查失业率呈增长趋势的原因：“16岁的年轻人基本上没上过大学，24岁不多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这一年龄段人群失业率较高的原因是，没上大学的没学历、没专业，刚毕业的技术技能不足，工作经历不丰富。针对没机会上大学的年轻人而言，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意味着相当一部分高中生没有进入到高等教育系列，为促进这部分人群就业，建议加快推进和完善终身学习机制，助其掌握一技之长，适应社会需求。针对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言，一方面是其就业岗位和待遇与其理想愿望有一定差距，一方面是其动手能力不够，适应不了工作岗位，这需要在高校培养阶段入手。”

在此基础上，郑军表示，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保障就业供给充分，需先从供给侧的“要素端”和“生产端”入手。针对大学毕业生而言，“要素端”即大学生，就业因素即就业能力与素质；“生产端”即培养大学生的高校，就业因素即高校人才培养的理念、思路 and 模式等。

在郑军看来，目前一些大学生就业观念出现偏差，高考上大学追求到大城市求学就读，就业时更是如此，不考虑工作单位性质，不管专业是否对口，不考虑工资待遇优劣，不愿意下基层到县城，更不愿意到乡镇。

“近年来，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国推进‘三支一扶’（即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计划、西部计划、选调生、支教生、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公费师范生等一系列

# 多方帮扶力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记者 李元丽

“2022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主委张大方表示，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高校毕业生48.3万人，新增6.5万人，增量、增幅均创历史新高。“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干货’，各高校也积极通过‘访企拓岗’等方式促进毕业生就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张大方如是说。

在张大方看来，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就业期望值普遍较高。校园招聘活动提供的用人单位数量较多，毕业生可选的岗位也较多，但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普遍不强，签约率偏低，“有业不就、有岗不就”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过分追求工作的稳定性、舒适性和优越性，不愿意到民企私企、基层单位和艰苦地区就业，更不会去主动寻求就业机会。二是帮扶政策宣传引领不足。据抽样调查，有近一半的学生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不太了解，更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高校虽然知晓各级政府对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相关优惠指导政策，但总感觉无从下手，不知如何便捷地应用这些扶持政策来帮助毕业生，导致政策落地实施的实际效果不明显而缺乏吸引力。三是政策性岗位选拔时间错配。当前，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政策性岗位，但因各种原因，相关选拔时间多在毕业生离校之际或离校之后进行，对于毕业生的积极求职心态造成了较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校园招聘活动和企业的实际招聘工作，人岗不匹配的矛盾较为突出。

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张大方建议：要政府统筹协调，促进多元就业。进一步强化宏观调控、健全完善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引

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的举措，但多数学生积极性不高，即使按计划到了基层，流失率也较大，有固定期限的到期就走，有些还没到期就要走。这就使得国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人才瓶颈出台了不少政策，但乡村人才仍然严重缺乏，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此，建议针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唱响到基层、到艰苦地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主旋律，转变其就业观念，既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又能促进区域发展。”郑军这样说。

从供给端看，许玲也提供了一个线索——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考研、考公务员、考编制情有独钟，部分大学毕业生“初战”失利宁愿再战、三战，也不愿意先就业再择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就业率。

“但有些问题也的确出了需求端。”据许玲介绍，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受冲击较大，而服务于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又是吸纳青年人就业的大户，这些企业目前新增招聘岗位较少，特别是师范毕业生，往年教辅机构是吸纳毕业生的大户，今年尽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加大各级各类教师的招聘，但师范毕业生要找到一个教职仍然很有难度，有些学生勉强找到岗位，却发现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质量、薪酬与预期有差距，这个现象本质上仍然是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还处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吸纳大量大学毕业生的能力要差一些。

“大学生就业的实质是高校专业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对接顺畅，则供给与需求能实现协调平衡和良性互动，包括人才供需的总量性匹配及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匹配。”要系统性解决供需匹配问题，郑军认为，应坚持两步走：一是稳就业政策应精准对应不同就业主体；二是稳就业政策应准确对应行业企业。

“根据上半年或往年的经济结构分析，对不同的产业结构、行业差别、区域差异等就业形势予以评判，出台结构性的支持政策，体现结构性政策的精准、直达、定向特征。根据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结构态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性质等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差异，让政策精准有效。有些政策针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有些政策针对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有些政策针对目前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政策措施应分类细化，保证政策有效果，促进稳经济稳就业有成果。”郑军这样表示。

在许玲看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运行顺畅，企业运转正常，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考题。

导，促进多元就业，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及边疆等地区和非公企业参加工作，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特别是根据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问题，制定“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实施细则”，对毕业生就业协议管理作出临时性调整，对“一对一”帮扶政策作出费用安排，调整制定重点企业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数量指标确定方法和激励性措施，调整制定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保证及其控制的策略，协调好各级职能部门、各类事业单位安排就业的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还应搭建多方平台，打通就业创业渠道。一是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定期发布各类人才招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聘、就业创业专项资金申请等信息，积极开展人性化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二是搭建产教融合平台。通过校企合作、校地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试点等方式，认真实施“特岗教师”“选调生”等项目，打通“就业创业最后一公里”，提前为实际就业锁定毕业生。三是搭建就业帮扶平台。人社、财政等职能部门应适当增加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困难补贴的额度（目前1500元/人），并为残疾、孤儿、烈属、少数民族和就业困难毕业生家庭开展精准帮扶，强化就业帮扶政策的落实落地。

最后，张大方表示，还需加强多方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各级人社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大学生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开展公共服务，构建覆盖院校、园区、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帮助各方优惠政策进行归集梳理并提供咨询，要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获得相应的税费减免、资金补贴等政策扶持。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参加创业竞赛活动，为创业投资机构、天使投资人等选择投资对象提供机会。要拓宽人事和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范围，将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作为重要服务对象，提供档案保管、人事代理、社保代理等服务。同时，媒体要正确引导“转变就业观念”的社会舆论，营造积极就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社会局面。

# 坚持问题导向 积极推动重点群体就业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全国政协常委，吉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王天戈表示，当前，按照党中央关于促进就业的决策部署，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公平就业法治化环境持续优化、就业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职业教育与培训促就业能力持续提升、重点群体就业和就业援助工作稳步推进。

在王天戈看来，就业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带动就业作用有待提升；经济欠发达省份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及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就业；结构性就业矛盾比较突出；劳动者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招工难”和“就业难”问题并存；重点群体就业任务依然艰巨；退役军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广度与深度都有待加强；就业公共服务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